

社区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纪念费孝通教授逝世7周年

马戎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马林诺夫斯基阅读了费孝通的《汇材经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费先生的《汇材经济》代表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费先生逝世已经7周年,但是他一生践行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依然为社会学的“本土化”有着重要的启发。实现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关键是社会学古人类学的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关键词: 社区调查; 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费孝通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2)03-0001-07

Community Survey and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Professor Fei Xiaotong

MA Ro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 Malinowski read the work *The Economy of Hui Cai* written by Fei Xiaotong and gave a high degree of evaluation to it. Also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Economy of Hui Cai* marke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school of sociology. Mr. Fei passed away for seven years, bu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o-anthropology which he has practiced in his life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The key to realize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i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soci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hinese school" of sociology be established genuinely.

Key words: community survey; Chinese sociology; indigenization; Fei Xiaotong

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与外部文化的交流。在历史上中原王朝曾多次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导致外部文化的传入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所以在我国的历史上,中外文化曾经发生过几次规模宏大和相当深度上的交流,对春秋战国、汉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等各个时期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形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高潮。

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我国被动地经历了一次外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近代中国在文化与科学、教育方面的发展,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设立与发展,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于西方,这与当时中西文化大交流这个历史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废科举,兴

新学,推行白话文,建立一整套西式学校体系,这些变化都为中国引进和发展现代工业化的人类文明成果起到了关键作用,完全改变了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格局。同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在对西方文明的接触、接受、思考、改造的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积极吸收国外文化和学术的精华,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努力创立和发展中国的新兴学科。

费孝通教授就是在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这一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之一。我们至今仍然在纪念费孝通教授的农村调查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理解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应当说,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

收稿日期: 2012-04-02

作者简介: 马戎(1950-),男,回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吸收了西方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引入了实地调查、实证性实验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全面改造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和治学方法,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在各个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坚持在结合国情、扎根本土这个基础上探讨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界得以走向世界。而费孝通教授在社区研究和“社会学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绩,则是他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一、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调查

作为学者要想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人类社会,要想科学地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结构、内在矛盾和演变规律,他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对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一般注重读书,而不重视社会调查。他们主要是通过读《经》(指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典)和《史》(指各朝各代的史籍和史论)来学习有关社会的知识^①。读《经》是为了学习社会规范和如何认识社会,读《史》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对于通过实地社会调查来了解、分析、认识社会,古人一般是比较忽视的。

这种重书本、轻调查的倾向,在我国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东周列国时代,有志向的读书人是很重视“游历”的。学者们在周游列国中既可以投师学艺,博采各国学派之所长,又可以考察各地社会和民情,分析各国治理方式的利弊得失,这也可视为社会调查的一种方式。在此基础上,有志于从政的就游说诸侯,提出“强国争霸”的对策,争取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有志于治学的就设馆讲学,广收门徒,潜心著书立说。读书无疑是学习既有文化的基础,但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灵感有许多应当是来自对各国社会实际的考察与思索。东周列国时期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一代盛世,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当时学者重视社会“游历”的风气。

东周之后,虽然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但是自宋朝程朱理学兴起之后,研读经史就成为读书人最根本的任务。“游历”也逐渐演变成落第文人消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像徐霞客这样认真游历的读书人在当时变得凤毛麟角。而那些进行社会调查的人,从流传到今天的章回小说和戏曲剧目内容来看,大抵是官员在新上任之时或需要侦破疑难案件时的“微服私访”。进入官场之前的读书人,只需“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了,似乎没有了解现实社会的必要。一旦进入官场,自然也有种种“潜规则”在制约他们的思维和决策,民间私访所获得信息与官场中的信息,相比对于他们的

升迁是无足轻重的。无论哪朝哪代,博引圣贤书是证明自己学识和为官资本的基础,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带有浓厚的思辩的人文色彩,而缺乏今天我们所说的带有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精神。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的文人们往往是从经史的“古训”中来理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来思考“如何仿效古代的成功事例以使社会变得更符合理想(如贞观之治)的样子”。所以每遇社会变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讨论应对策略时往往带有“复古”的驱动,“言必称先贤”,而不是通过开展社会调查来了解现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据此提出行动方案。像王安石那样比较注重社会实际的改革家,在知识阶层当中为数极少而且极为孤立。总的来说,脱离社会而以“师古”和“循规蹈矩”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是有重大缺陷的,缺乏对社会现时发展趋势的实感和直觉,所以也绝对成为不了开国皇帝和大政治家^②。而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官员,大多比较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调查和分析,敢于提出一些“古训”之外的治理国家的思路和办法。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二、《江村经济》在我国社会学发展史中的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思路以及系统性和有具体目的性的社会调查被介绍到中国来,大致是20世纪初的事,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一同来到中国的。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其产生和发展中都受到当时西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实证主义的色彩。即使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经典著作中也包含了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这些经典研究对实地调查和统计资料都是十分重视的。

通过不同的学术渠道,在20世纪初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也开始注重社会调查。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时间是在30年代初期。正是通过实地调查,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革命的成功战略。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当中,他是最注重社会调查的。1930年江西苏区时期,他专门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反对教条主义,倡导社会调查。他在这本书中讲的话,有许多与费孝通教授教育学生时讲的话是一样的,这里也反映出他们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的人来说,这个相通之处也是最实质

性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受到过西方教育的还是在国内读书的年轻知识分子,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源自于西方并已成系统的社会科学学科应当如何在中国建立,在建立过程中应当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学术思想传统和学科设置体系?“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中国是否应当“全盘西化”等论题的大讨论,反映了当时各个年龄、各类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观点。

在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学学家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这是通过开展实地调查、联系本土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并进而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尝试^[1]。调查结果中较著名的有1930年出版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陶孟和)和1933年出版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李景汉)等等^②,这些调查活动及有关出版物,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实地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韩明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把这一个时期的社会调查称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里程”,认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2]。

费孝通教授1936年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和随后写成的《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3],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实地调查的第二个阶段,它在内容和方法上是比第一个阶段的调查工作更为深入和系统。说它代表着一个更为深入的阶段,是因为它不但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并进行了实地调查,而且应用了“社区研究”(也被称为“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费孝通教授讲:“布朗教授在燕京大学演讲时已说,‘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4]。换言之,社会调查多少有些像“民族志”调查的方法,而社区调查则努力在认识社会的理论归纳方面进行提高。

我们也许可以说《江村经济》是我国最早开展的严谨、系统的“社区调查”之一,虽然费老自己谦虚地讲“《江村经济》可说是我个人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5],而韩明谟教授则把这部著作看作为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第二个里程(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中的代表作^[6]。

中国学者在此之前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以专题调查和描述性调查为多,真正对一个小型社区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和带有理论分析色彩的社区研究则很少。在理论和方法上,费老的《江村经济》采用了功能主义的思路和规范的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系统和详尽地介绍、分析了我国江南的一个村庄^④。这在当时国内和国外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⑤。

在当时去国外攻读社会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中,多数是以国外的材料写作学位论文,

如吴泽霖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1927年)、吴景超的《唐人街:共生与同化》(1928年),由于这些论文在国外没有正式出版并且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些论文在当时国内学术界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概括地说,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开弦弓村调查和《江村经济》的意义在于:(1)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地调查;(2)采用了系统、深入的社区研究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3)有系统完整的理论架构(功能学派);(4)抓住了调查地点的社会变迁作为研究重点(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讲,“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社会。

马林诺夫斯基在他为《江村经济》写的“序言”中,对这部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这部著作“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从世界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他对《江村经济》所总结的意义是:(1)在研究的形式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是人类学“本土化”的重要尝试;(2)从研究对象来说,是对“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是人类学从研究野蛮族群到研究文明民族的跨越;(3)这部著作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正在努力创建新的“中国学派”并走出“象牙之塔”。他不无赞叹地说,“中国社会学界已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中国的)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阅读中国人生活这本公开的书本,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怎样思考的”,而从中得到的知识“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7]。这三个方面,对于当时国际人类学来说,都是重大的突破。

在“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还引用了罗斯爵士的评语。罗斯爵士认为《江村经济》这本书“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8]。《江村经济》是一个系统完整、思路清晰的社区研究,当时这样的研究在国内尚十分缺乏。在被介绍到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社区研究成果当中,《江村经济》应当算是第一本。

无论是从国内社会学的发展还是从国际学术界的角度来说,费老“江村经济”研究中最核心的和最具有开拓性的,就是这一研究的“本土性”和“社区调查”的研究方法。

社区研究的方法对于国人之所以重要,具有

多重因素。首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留着大量有生命力的成分,其中有些成分沉淀在民间的道德、观念和习俗之中。如何把仅存在于书本中的僵死的部分与在民众生活中仍然发挥作用的具有活力的部分区别开来,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对现时社会的调查来分析和确认。应当认识到,解释中国现实社会构成及运行的基本素材和许多道理,从未被皇朝统治者所承认也因此也没有被记入文字典籍^⑥,而只存在于社会实际生活当中。即使是生长在中国的学者,也只有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在深入社会和与民众的广泛交往过程中,才能接触到这些基本素材,了解这些道理,认识和理解中国本土社会。说有些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社会,这并不是开玩笑。所以社区调查不仅仅可以被我们用来检验西方的理论、方法、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也是中国学者鉴别本国文献、认识本国国情的必由之路。

三、社会学的“本土化”

人类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是多源头的,带有很强的乡土性和地域性。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玛雅文明、古华夏文明等都各具鲜明的特色,彼此各不相通,充分地体现了人类文明衍生和演变的多样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实体,其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经济活动等等都各具特点,也可以称之为今日世界的“多元文化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市场的拓展,这些“多元”社会实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在“多元”之上又开始逐步形成了某种“一体化”的东西。这里的“一体化”不仅仅是指形成了一些指导和保障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得以顺利开展的“共同规则”(如国际公约),而且带有相当程度的“文化融合”的意义。

这种在“多元”(个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体化”(共性)倾向,在科学技术、经济活动、文化体育活动中是如此,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如此。但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甚至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毕竟是西方学者从西方文化传统和西方社会的实际运行当中归纳、总结出来的,与其他文化和其他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甚至很不符合。如西方讲的“家”(family),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就很不相同。西方讲的“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s),意思与中国传统中所讲的“民族”的含义都不完全相符,所以用西方的“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s)的定义和概念都很难解释我国的“汉族”——这个11亿人口大群体的形成和它的“民族/族群意识”的特点。

在发展中国文化并加入国际学术界的过程中,我们无疑需要继续努力借鉴和吸收西方社会

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需要“先做学生”。但是在“做学生”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明确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把这些知识与自己国家的社会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以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以中国文化的鲜明特点及其对周边地区的深远影响,在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应当有人出来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总结中华文明的精华,而中国学者对于这项学术工作自然应当是“当仁不让”的。在研究中国社会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研究中华文明当中总结出来的智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所以,在各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逐步发展出“中国学派”,是势在必然。如果忽视了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学术上的努力很可能只是成为某外国学派的“中国支部”。这样做无疑会在西方学术界大受欢迎,但恐怕只能一辈子给洋人做学生而无法在学术上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中国学者的出路就在于要把两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中,而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即在于此。

有人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本土化的就不是科学的”。这种提法混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重要界限。自然科学在进行实验时可以人工制造出“真空”,作为实验材料的物质和金属可以提纯。所以利用同样的实验条件和实验材料,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进行同样的实验,应该得到完全同样的结果,否则就不能证明其“科学性”。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对于研究社会的人来说,他无法创造一个“社会的真空”这样的实验环境,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国人也无法等同于中国人。能够解释美国社会现象的某个理论,未必能解释中国的现象。而能够说明法国人心态的思路,未必适用于解释日本人的心态。潘光旦先生从生物学的角度曾经说过,在不同国度中生长的同样的植物物种,在外观、形式上可能非常相近,但是仔细研究,它们的生长规律及内在的活动机制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⑦。“江南有桔,移至江北,则化为枳”,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从肌体到思维都千差万别的人类。

当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在地球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与历史上任何年代相比。各个国家、地区的“乡土性”也在逐渐减弱,而且越是在与其他国家接触频繁的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和大都市,“国际化”的程度也越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文化和心理的深层次,民族性和

乡土性仍然根深蒂固地保存着。这在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等国家都十分明显,中国也是同样。

外来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要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变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就需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也正是由于在实践探讨当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断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或“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

费孝通教授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瑶山调查、江村调查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行行重行行”,可以说从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典型代表。

四、“社会学本土化”的关键: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中国的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以来,已经经历了30多个年头。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开始崭露头角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今天在多大程度上被年轻一代社会学家继承了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国际学术界(以马林诺夫斯基等为代表)为什么把当时我国社会学家们的研究称之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这个方面取得共识之后,我们才能明确努力的方向,并在目标一致的条件下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根据前面对于《江村经济》学术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社会学目前能否继续不断地深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把西方的理论、方法、观点与中国的社会实际联系起来,而其联系的桥梁只能是通过实地的社会学调查(特别是采用社区研究的方法)来对这些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检验,摒弃不适用的部分,吸收、借鉴那些有用的成分,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的社会学。由于社区调查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问题。

在20世纪20-30年代,正是由于看到了要把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的社会学需要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借鉴人类学。当时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请来了在美国倡导社区调查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派克(Robert Park)教授、英国的拉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教授和布朗(Radcliff-Brown)教授等来华讲学,并把费孝通、李安宅、林耀华等学生分别送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等著名学校,向马林诺夫斯基教授这样一些当时最有名的人类学家学习。30年代清华大学成立的系,名称是“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国

外的这两个学科进入中国之后,在中国的国情下紧密地联系和交叉在一起,其中含有很深的道理。这个传统,在80年代以来重建中国社会学过程中,应当被我们有意识地继承下来。1992年费孝通教授提议把他亲手创建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是有意识地希望我们能够自觉地去努力继承这一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一方面是注重社会调查、立足中国本土国情的毛泽东,另一方面是“食洋不化”、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王明等人。在其他学科甚至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也是如此。如李四光也是依照中国地质结构的国情,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地质理论,为中国的石油勘探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费孝通教授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他谈到英国的人类学家弗斯(Raymond Firth)教授曾提出“微型社会学”的概念,用以表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特点,并说“微型社会学是人类学在战后可能的发展方向”^[10]。这即是指人类学传统的对落后民族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通过中国学者的实践证明,完全可以应用于文明民族社会的研究,而随着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必然也将推动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有大的发展。在对本土社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又必然会使人类学家借鉴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调查研究成果。

中国的社会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这就是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用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变迁。这种结合为当时西方学术大师所肯定,甚至认为开拓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是今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研究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关键。

五、如何克服“微型社会学” (社区调查)的局限

“微型社会学”是指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如村落、街区、企业、学校)作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的活动机制。英国的利奇(Edmund Leach)教授曾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提出过疑问,“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他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疑问:个体或局部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体。

费孝通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从理论的角度说明“人文世界里的‘整体’必须和数学里的‘总数’在概念上区别开来,这是‘微型社会学’的理论基

础”^[11]。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一个社区,一个村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解剖好一个麻雀,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他麻雀,对我们了解其他鸟类(乌鸦、孔雀、大雁等)的身体结构特点及各部分的功能也有极为重要的启示。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完全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 and 研究方法,来判断一个社区对于整体社会的代表性。我们现在通过宏观的人口普查资料 and 经济社会统计数字年报,把我们所调查村落的户数、人口数、人均耕地数、人均牲畜数、人均收入这些在调查中得到的具体数据,与区域性(县、省)、全国农村的相应数字进行比较(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耕地、牲畜、产值数字,统计局农村调查队搜集的居民收入支出数字均可参考)。这样就可以对被调查社区在资源占有、经济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在该地区(县、地区、省)乃至全国农村中是居于哪个水平,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做出一定的判断。

这种与地区、全国数据的比较和判断,可以在调查工作完成之后进行,作为对被调查地点代表性的讨论部分。也可以在调查之前先做一部分,把对人口普查和统计数字的分析,作为我们选择具体调查地点(社区)和进行抽样的依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人口学的宏观定量分析、社会学的户访问卷调查的长处与人类学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长处,弥补各自的局限。既有点(村、户)的深入细致的信息,又有面(省、县)数据的讨论和比较;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果用以相互印证和互相补充,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利奇(Edmund Leach)教授所说的“微型社会学”社区调查数据在代表性上可能出现的局限。

“微型社会学”研究除了调查地点在地域空间上具有局限性之外,在时间的纵向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江村经济》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在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时,把社会学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12]。费孝通教授认为“今后在微型社区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是研究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13]。因此也可以说,社会学与历史学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的相互结合,也是我们今后提高社区研究和社会学整体研究水准的一个有效的重要途径。

各个学科的发展是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同步的,城乡之间、国家之间、产业之间的交流、融合

程度在不断提高。每个学科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也自然而然地被其他学科借用,从而出现各学科在研究选题、研究方法、使用资料方面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现象。近十几年来,真正有价值、具有开拓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不是在各学科的传统研究专题上,而经常出现在跨学科、学科交叉的研究专题和领域方面。甚至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也出现了在选题和方法上的交叉现象,这是国际学术研究发展的大趋势。在大学里培养学生时,有必要强调打好一个主修学科的基础知识,但是我们不必把学科相互之间的界限看得太重。中国古代的学术活动,注重的是学术流派,而不是专业分科,是一种重在内涵的“通才”教育,也许培养不出专业的操作性人才,但是却有培养“大师”级学者的潜在可能。仔细思考这个传统,自有它的道理。总的来说,学科的系统性知识应当作为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中的知识基础,并在研究实践中自由地运用。同时学者在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应当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合用,就用什么”,“管他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人类社会的知识都是相互融会贯通的,我们不当受到具体学科框框的束缚,任何其他学科的有深厚学术基础、有创新远见的学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都可以成为我们吸取知识的源泉。

社会是综合性的复杂群体,在研究对象方面我们不可能清晰地划定学科的“边界”,同一个社会现象可能几个学科都在研究,只是各自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着重点。在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各个学科之间“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应当是各学科发展的共同方向。

六、以区域类型/发展模式分析为手段, 从局部研究过渡到全局性整体分析

当年马林诺夫斯基曾对“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提到中国社会学者们将会把自己的著作“综合起来,……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对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像《江村经济》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14]。对于中国各类基层社区(村庄、学校、企业、城镇、政府机构、寺庙、军营、非政府组织等)开展调查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将逐步汇集在一起,相互编织交融,构成一幅完整地描述中国社会结构、描述中华民族发展轨迹的宏伟画卷。这是这位老一代人类学大师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青年学者提出的殷切期望。

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停顿了近30年。自1979年受命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以来,费孝通教授得以重新开

始他的社区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虽然由于年龄和工作条件的种种限制,他已经不可能再像当年大瑶山调查、开弦弓村调查那样长期蹲点,但是当年社区调查的精神依然不变而且在选题和调查范围又有了很大的拓展。这既体现在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中,也体现在他多年里写下的《行行重行行》的篇章当中。从沿海到边区,从村落、乡镇到区域,他的足迹和写下的文章体现了他不断开拓,努力对中国社会各类社区、各种模式发展道路进行实证性研究的精神。

在今后10年或20年当中,摆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年轻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继承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在这个方向上所进行的努力,划分出我国各地区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类基层社区(村庄、企业、街区、学校等等)的系统调查,在调查活动中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再进一步从个案调查发展到社区类型的归纳,从基本类型社区的研究,逐步发展到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再进而过渡到具有全国性的大型专题研究。这样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渐积累,就可以完成对中国国情的整体性描述和系统性分析。而且,这种描述与分析,将不仅仅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而且应当描绘出在跨世纪的年代里,中国人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经历了社会体制变化和文化变迁的足迹。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作为费孝通教授亲手创建和亲自指导的研究机构,在完成这一任务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自成立以来的30多年中,我们研究所组织了本所人员和兄弟研究单位的人员,已经在全国许多地区^②对不同类型的基层社区(农村、牧区、企业、学校、城市街区、寺庙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但是我们完成的调查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有些调查仍然只能算是社会调查,而不能列为费孝通教授定义的“社会学调查”。我们完成和发表的调查报告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但是在理论方面的总结和提高还没有跟上来,距离费孝通教授对我们的期望仍十分遥远。费孝通教授辞世已经7年了,我们始终怀念这位谆谆教导我们多年、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抱有很大期望的老先生。我们应当继承费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建设方面的遗愿,思想开放地吸收国外的学术营养,同时深深地把我们的研究工作扎根在中国的土壤。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是明确的,只要在这个方向上不懈地进行努力,最终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相信,在我国社会发展、学术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具有共识的朋友

们也将会与我们共同努力,通过我们踏踏实实的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逐步为中国社会学在21世纪的创新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宋江在江州所题反诗中的第一句就是“自幼曾攻经史”,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学识”的标准。

②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萨孟武在《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中指出,在中国只有大流氓、大地主可以当开国皇帝。他指的是这两类人在道德方面不受“古训”的约束,在组织方面凭靠“义气”结党形成夺取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知识分子则缺乏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同时,知识分子过于注重读书而缺乏对社会的了解,这也是他们难成大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参看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90-104。

④所以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说,阅读这本书“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费孝通,1986:4-5)。

⑤尽管这本著作的英文本在1939年出版后即介绍到国内,但是遗憾的是,这本书直至1986年才译成中文,与国内读者见面。

⑥有些偏执的皇帝还屡兴“文字狱”,对这些文化遗产大肆摧残,焚书坑儒。

⑦30多年来,我所研究人员开展实地调查的足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北大社会学系打通以来,承接的研究课题和各项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

参考文献:

[1][2]韩明谟.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潘乃谷、马戎.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83-188.185.202.

[3][7][8]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1-3.

[4][5]费孝通.云南三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2.

[9]潘光旦.自由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271.

[10][13]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J].北京大学学报,1996,(4).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唐仲山]